



李文成起义

李文成起义

中共滑县县委宣传部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记述了发生在公元1813年以滑县为基地的一次农民起义的史实。这次起义虽仅九十三天，但波及豫、鲁、直、晋四省，而且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刺进了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北京皇宫，致使清朝皇帝“椎心挥泪”、惊恐万状。作者以大量的史料揭露了清代官吏豪绅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造成了官逼民反，歌颂了以李文成为首的广大农民起义英雄们的斗争业绩，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李 文 成 起 义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乡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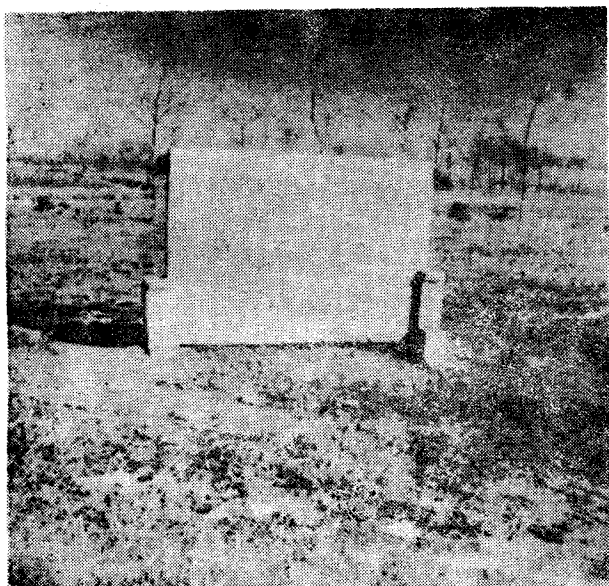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frac{1}{4}$ 印张 32千字 1插页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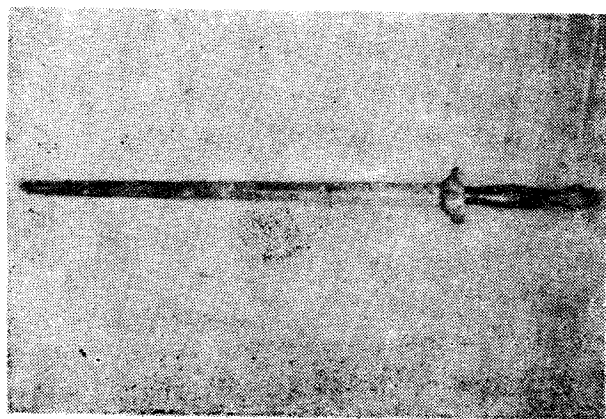
印数 1—2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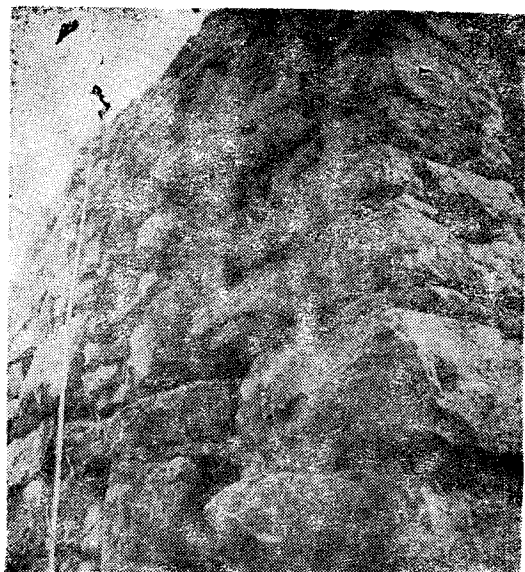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1105·16 定价 0.18元

滑县城东北五里谢家庄所在地李文成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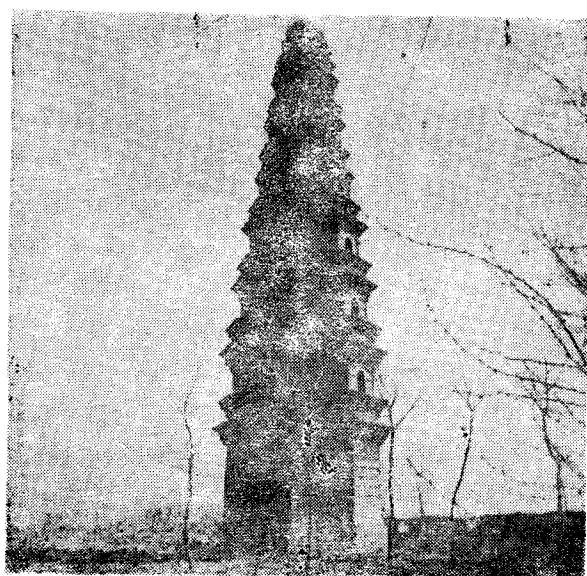


天理教起义军的剑





辉县司寨西北角遗址



明福寺塔
(解放后重修)

目 录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
残酷的压榨.....	(1)
严重的天灾.....	(5)
人民的革命传统.....	(7)
二、滑台春雷动，四方举义旗.....	(9)
李文成决心造反.....	(9)
起义的组织和准备.....	(12)
滑县响惊雷.....	(22)
直、鲁起狂飙.....	(28)
三、中原鏖战急，热血洒太行.....	(35)
攻打浚县城.....	(35)
道口激战.....	(39)
司寨浴血战.....	(43)
滑城保卫战.....	(49)
四、血沃中原肥劲草.....	(57)
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	(57)
不朽的业绩.....	(63)

十九世纪初期，我国的华北原野，兴起了一阵农民革命的狂飙。它的来势如此地猛烈，在很短的时间里，“骚动四省”，风波所及，南至长江，北到长城以外，并且矛头直接刺进了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北京皇宫。这种突如其来的革命风雷，不仅当时使刚刚受过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冲击，惊魂甫定的清朝皇帝嘉庆“椎心挥泪”，惶恐万状；而且在事件过去之后，还使他“追思尚心悸”，战栗不已。这场使阶级敌人胆裂的革命风暴，就是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斗争。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以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农民起义，爆发于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这次起义斗争，是以河南、山东、直隶^①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而以北京为前哨，滑县为基地。它的发生，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残酷的压榨

在镇压明末农民革命运动的血泊上建立了对全国统治的清王朝，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和榨取。特别是

^①清代直隶省包括今天的河北全省和河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的各一小部分。

到了十八世纪的末期，清王朝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更加暴露出来。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和政治上的腐败黑暗，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从清王朝建立那天起，就开始了对各族人民的土地的大规模的圈占和掠夺。到十八世纪以后，土地更大量集中到满汉地主阶级的手里。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已经是“田亩多归缙绅之家……约计小民之有恒产者，十之三四耳”^①，到了嘉庆年间，情形就更为严重。河南巩县的恶霸地主康百万，霸占土地十八万亩。大官僚和珅，抢占农民的田地更多达八千顷。

失掉了土地的贫苦农民，被迫沦为地主的佃户，忍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早在乾隆时期，地租率就已经是非常高了。邻近滑县的汲县，根据当时的县志记载：“农人自备牛具车辆，佃种人田，谓之代地（原注：收获粮草，与主人均分）。自种者少。亦有田主出牛具，招人代种者，谓之庄家（原注：大概麦二八分，秋三七分，柴草俱归主人）”^②。这就是说，佃户要将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七十甚至八十缴纳给地主。汲县是这样，河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在这种沉重的租额剥削下，佃户们“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完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仅堪糊口，最为贫苦”^③。

重租之外，农民还要遭受高利贷的盘剥。那些地主豪商，

①王氏《东华续录》康熙卷七十六。

②乾隆《汲县志》卷六，《风土》。

③《心政录》卷二，《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事》。

乘青黄不接的关头，大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乾隆末年，河南连年遭受灾荒，连山西的地主商人也乘机跑到河南，举放利债，吞并了不少农民的土地。

封建政府的赋役剥削，也十分严重。拿全国赋税正额来说，乾隆年间每年经常是征收白银四千五百万两左右，最多时达到四千八百万两，比清初顺治八、九年间增加了两倍。由于官吏的贪污中饱，早已形成“官取其一，民出其三”的规律，所以人民的实际负担，比所谓正额要多上几倍。此外，还有不少的苛捐杂税以及难以计算的差役、摊派等等。这些繁苛的赋役，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的身上。

清朝还有所谓“捐纳”制度，就是可以用银钱买到大小官职。当时买京官最高可以买到侍郎（中央各部的副职），买地方官最高可以买到道台（知府以上的官员）。这种把官职当商品出卖的恶风，到了嘉庆时期，更是空前严重。买官到手的“政治商人”，比起一般官员，贪污尤其厉害。所谓“贪不贪，一任州官，雪花银子三万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清代官僚搜刮人民膏血的生动写照。嘉庆年间，山东还有这样的民谣：“大官也是官，小官也是官，不问官大小，都是为俩钱。”更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官僚人人贪污的反动本性。而这些“雪花银子”和“俩钱”，无一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这一帮吸血鬼——皇室、官吏、地主、豪商，在劳动人民的血泊和白骨上，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北京一个米商，“富逾王侯”，单是家里的房屋就

有一千多间，亭台楼阁，壮丽非凡，十天也看不过来。江南一个官僚地主，夏天晒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狌一类的皮衣，脱毛积地竟有三寸多厚。至于吃的，更是挥金如土，极尽享受之能事。象《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所描述的，贾府举行一次螃蟹宴，就花费了很多银钱，用刘姥姥的话说：

“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清朝政府和官僚、地主、大商人等吸血虫的层层盘剥下，生活十分悲惨。即令在所谓丰年时期，也已经是“日给之外，已无余粒”。如果“一遇旱潦，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①。当时困苦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镇压和防止人民的反抗，清朝政府在法律中规定了很多残酷的条文。在《大清律》中，“谋反”就是所谓“十恶”的第一大恶。还制定了各种对付人民的残暴酷刑，如凌迟、寸磔、饲狗、梟首、戮尸、灭族等等。对私自结社、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编写或演唱违禁词曲以及有碍封建秩序的言行，也都严厉禁止。此外，还特别强调要维持所谓“主仆名分”，规定奴婢、雇工犯罪，都不能“以良人论”，劳动人民在法律上不能和地主平等。对无力缴纳拖欠地租的贫苦农民，也要加上“刁佃”、“欺慢田主”的罪名；如地主控告，清政府就要强迫佃户即行全部交清。在封建政权的保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政》。

护下，地主们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将佃户家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还甚至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对这种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是决不会永远忍受下去的。

严重的天灾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更加重了天灾的危害性。在嘉庆十七、十八年间，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接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说明灾害的具体情况，现抄录几条有关记载如下：

“(滑县)嘉庆十七年，旱。十八年，大旱，大饥，民困，饿死者众”。①

“(浚县)嘉庆十七年，旱。十八年夏，大饥。”②

“(辉县)嘉庆十八年春，旱；八月，淫雨十日。”③

“(阳武县)嘉庆十八年春，不雨；……八月，大霜，饥。”④

“(修武县)嘉庆十八年春三月至夏，五旬不

①同治《滑县志》卷十二。

②道光《浚县志》卷三。

③道光《辉县志》卷四。

④民国《阳武县志》卷一。

雨；秋八月廿五日，淫雨八日，丹水溢，陆地成河。”①

“(大名县)嘉庆十七年，旱，遍灾。十八年，旱，饥。”②

“(长垣县)嘉庆十八年，旱。”③

“(东明县)嘉庆十八年，岁饥；秋，大霖雨四十余日。”④

“(定陶县)嘉庆十七年，旱，大饥，盗贼蜂起。”⑤

“(曹县)嘉庆十八年，……大饥；八月，淫雨连绵四十余日方止。”⑥

“(金乡县)嘉庆十八年，旱，大饥”。⑦

从上述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嘉庆十七、八年间，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交界地区和附近州县，普遍发生了严重的旱、涝灾害。“被旱之区，将及千里”⑧。其中特别是河南省卫辉府所属地区，灾情更为严重。当时有一个官僚曾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对这里的灾害情况向嘉庆

①民国《修武县志》卷十六。

②光绪《大名县志》卷二十六。

③道光《大名府志》卷四。

④民国《东明县新志》卷二十二。

⑤民国《定陶县志》卷九。

⑥《曹县方志》第二编。

⑦同治《金乡县志》卷十一。

⑧《仁宗实录》卷二七〇。

皇帝作了一个汇报，他说：“卫辉府所属地方，去冬（嘉庆十七年冬）雨泽稀少，二麦多未播种；春间又未得有透雨，虽于本月（三月）初七、八等日得雨三、四寸，因枯旱已久，大田仍未能翻犁耕种。贫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缘该府地方，近三、四年来，总未大稔，粮食腾昂，是以民情倍形拮据”①。

从嘉庆十八年正月起，清政府就感觉到豫、鲁、直三省交界地区灾荒的严重性了。为了防止农民起义的发生，一直到天理教起义爆发的前几天，嘉庆还接连不断地多次下“上谕”，说什么要“缓征”、“免除”这一地区的“新旧额赋”，还要“赈济”、“贷籽种口粮”②。可是，这种假惺惺的鳄鱼眼泪，是制止不住人民群众的革命火焰的。革命的炮声终于在滑县打响了。

人民的革命传统

前面已经谈到，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是以河南、山东、直隶三省的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具体地说，河南的卫辉府，山东的曹州府，直隶的大名府，这三府所属地区和附近州县，是这次天理教农民起义的革命摇篮。其所以如此，也不是偶然的。

豫、鲁、直三省所属这三府地区，除和全国其他地区一

①《仁宗实录》卷二六七。

②《仁宗实录》卷二六五——二七三。

样，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外，还有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其他条件。

首先，这三府在地理位置上犬牙交错，紧相毗连，风俗人情又基本相同，便于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联合斗争；而在行政区划上，它们却又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省分，互相隔离，又是各省的边沿地带，因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种情况，极有利于革命的传播和发展。

其次，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除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和一般自然灾害的袭击外，又长期遭受着黄河的灾害。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黄河决口泛滥就有一千五百多次，比较大的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它象一条黄龙似的，在这一地区滚来滚去，这就更加重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灾难。因此，我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斗争，都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爆发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再次，这一带在很早以来，就是白莲教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而天理教又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因而它在这里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易于传播和发展。而天理教的广泛传播，就使这一地区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刽子手那彦成曾说：“滑县地方，幅员辽阔，愚民习教者多……风俗素称强悍”^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就使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交界地区成为天理教农民起义的革命摇篮区，而滑县则成为这次革命爆发的火山口。

^①《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五。

二、滑台春雷动，四方举义旗

李文成决心造反

河南滑县老城（今城关公社所在地）东北五里，有个谢家庄，天理教的著名领袖李文成，就出生在这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文成的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也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家中只有一点薄地和三间草房，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还在文成年少时，父亲就在穷困的折磨下去世了。他学会了做木工活，并在哥哥们的帮助下，一度进私塾读书。他喜欢研究算术，对读孔孟“四书”非常厌恶。在学习过程中，他善于独立思考，经常提出疑难问题，同塾师辩论。但这触怒了那个维护孔孟之道的塾师，不久，竟被撵出了学校。此后，文成一方面坚持自学，“专研算术”，还学会了一些天文知识；同时，仍从事着父兄所习的职业，并成为手艺高明的木工。因为文成在兄弟辈中排行老四，所以人们都称他为“李四木匠”。

当时，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文成家和全国各族劳动人民一样，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仅有的一点薄地不足养家糊口，做工又常受官府和豪绅的敲剥。那时的匠人，都必须到衙门里值官差，而且照例不给报酬。这种无偿的徭役，给文成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困难。父亲去世后，家中生计更为困苦。文成从小就对这种值官制度十分痛恨。

文成常在县衙做工，又不断看到穷人和地主豪绅打官司的情景：“富翁上堂高台坐，穷人上堂跪地皮。”“有钱就有理，无钱坐监狱。”厅堂上那些竹板、皮鞭、压杠等各种刑具，无一不是对付穷人的。这一切都在文成的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

文成的长兄文山，曾被召往县衙修花园。他没明没夜地干了十几天，累得精疲力竭，衙役卢安邦^①反说他“磨洋工”。文山稍一争辩，竟被拳打脚踢，关进监狱。文成家只好变卖家产，托人求情。最后文山虽被释放，但因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悲愤成疾，又无钱医治，出狱不久便含恨死去了。

接着，因地主逼债和不能按时交纳税款，文成的二哥文林又被县官抓进监牢，严刑拷打，活活逼死在狱中。

沉重的压榨，残酷的迫害，使李文成内心深处埋下了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深仇大恨。后来，恶霸毛天庆包工承修老君庙，硬拉李文成等去做工。完工后，毛天庆把工钱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对文成等不但分文不给，反而说这是“值官差”。李文成忍无可忍，率领大伙去找毛天庆讲理。毛天庆吓得不敢露面，却又暗中勾通官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文成逮捕下狱。文成恨透了官府，恨透了那吃人的世道，发誓永不再给官府做活。经乡亲们营救出狱后，每有官差、官活，他或称

^①《那文毅公奏议》和《靖逆记》中均作陆安邦，据调查实系卢安邦

病不往，或躲避逃匿。县衙见文成屡召不应，十分恼火，便派公差到谢家庄寻衅，要抓走文成的妻女，引起了群众的愤慨。李文成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的仇恨怒火了，他挺身而出，和公差展开搏斗，把狗腿们打得狼狈逃窜。

文成的妻子张氏，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劳动妇女，有胆量，有见识。她见文成打了公差，知道官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立即劝文成暂时外出躲避，免得再遭毒手，自己也带着女儿到附近沙河头村避难。当县署再次派人来抓李文成时，扑了个空，便抄了文成的家。

李文成出走他乡，四处流浪，更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深刻地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扩大了眼界，反抗思想与日俱增。同时，他也结识了具有同样造反思想的牛亮臣。

牛亮臣也是滑县人。曾在县里几次应试都落了第，就在近城乡村中教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又充任县库书吏。一八〇六年（嘉庆十一年），因“亏用官项”，被迫出逃。在外边的流亡生涯，使他进一步看到了清朝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也看到了劳动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反抗力量。他加入了八卦教，成为反清秘密组织中的一员。他听说李文成怒打公差，抗拒官府，十分钦佩，就到处寻访他。

李文成和牛亮臣终于在滑县城东傅庄的南地见面了。两人都难以抑止住自己的激动。他们相互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倾吐了各自的胸怀，进一步树立了推翻清朝黑暗统治、争取幸福生活的革命壮志。李文成愤慨地说：“要想不受官府欺，除